

抗战时期,中国军队付出了极大代价,但到底消灭了多少日军,至今众说纷纭,甚至连每次战役歼灭多少日军都莫衷一是。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虽然跟战场上各方统计数据有失精准不无关系,但最主要还是因为交战双方都会出于种种目的夸大自己的战绩。

抗战时期中日战绩背后



▲淞沪会战时国民政府妇女部长慰劳国军将士

为鼓舞士气,在宣传时注水分

抗战中,为了鼓舞士气提振民心,交战双方在对外宣传时往往会夸大自己的战绩,同时把自己的损失往小了说。这在国军的抗战宣传上几乎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据时任国军第18军18师参谋长的赵秀昆回忆:“抗战中期,国民政府军委会军令部曾通令部队,为了‘国际影响和鼓舞士气’,对于战场伤亡和毙、俘敌军可以‘以一报十’,而各部队又据此层层加码,神话式的‘战报’就出现了。”当然,实际情况可能不像赵所说的“以一报十”这么夸张,但把战绩往大了说倒真屡见不鲜。

比如大的战役方面以台儿庄会战为例,此战日军承认的伤亡是11984人,李宗仁向蒋介石报告的歼敌人数是2万余人,而当蒋介石向外宣布大捷时,数据成了:“是役敌死伤三万余众,我缴获步枪万余枝,轻重机枪九百三十一挺,步兵炮七十七门,坦克四十辆,大炮五十余门,俘敌无数。敌板垣及矶谷师团主力业已被我歼灭。”很明显是做了一些夸大。

为争取美援,编造大捷

除了提振民心之外,在抗战后期,夸大中国军队的战绩更是可以为帮蒋

介石从美国那里争取到更多的援助,为此,国军甚至不惜制造所谓的“大捷”。

比如国民政府在1943年6月对“鄂西大捷”的宣传,据时任第18军18师参谋长的赵秀昆在《抗战期间武汉失守后的十八军》一文中回忆:1943年5月下旬,(日军)向长江南岸的18军防守的石碑要塞进攻。六战区尽其所有兵力,增援十八军,但未能阻止住日军攻势。……蒋介石急令六战区留11师固守石碑要塞,其余均后撤到茅坪、野山关一线,组织新的抵抗。18军18师在撤退中发现日军已经趁夜全线撤走,向军长方天报告……(我)直接以电话报告军令部。蒋介石接到报告后喜出望外,命军令部次长林蔚直接以电话告18军军长方天,大意:你们这次打了一个大胜仗,国内外影响都很大,老头子很高兴,指示要大加宣传,嘉奖有功将士。

而对于蒋介石亲自指示夸张宣传所谓“鄂西大捷”的目的,赵秀昆还专门做了很明确的说明:我作为当时作战的当事人,认为(蒋这么做)是鼓舞军队已经极为低落的士气,至于其它用意,当时也不理解。其后,在六月五日中央社发表的一段消息中,才知道蒋介石有意夸大战果还有乞求美援的作用。

为“加官进爵”,将领谎报战绩

除了振奋民心 and 争取援助外,更多“虚报夸张,以败作胜”的现象源自于国军将领们谎报战绩,不管是战区级的司令长官还是基层军官似乎都有此喜好。比如余汉谋所谓的“粤北大捷”。余汉谋的十二集团军自1938年冬失守广州后即退守粤北主阵地,其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部驻韶关。1939年日寇南支派遣军从广州大举进犯粤北,先头部队已到大坑口,韶关告急。后因日军要把兵力转投桂南会战而逐步退回广州原

阵地,余汉谋指挥部队趁势追击日军取得了一些战果。余汉谋随后竟上报蒋介石吹嘘说毙敌一万多人。如果说日军的数据也不一定准确的话,那么余汉谋的顶头上司张发奎提供的数据则更可信一些:“1000余敌人之骸骨埋葬在北江的草莽中,数十辆汽车之战利品进入我们的仓库,以及敌之倭奴军官数人和士兵58人,以颓丧之面色,屈膝在我们的前面……”由此可见“毙敌一万”的说法完全不靠谱。

张发奎本人还道出了所谓“粤北大捷”的真相:“根据余汉谋呈交给我的,而我又转呈给中央的报告,我们在粤北打了一场大胜仗。但事实上我们被打败了。既然余汉谋宣称他已立功,我自然不想去同他作对。于是,我利用这个‘粤北大捷’举荐余汉谋接替我担任战区司令长官。”上行下效,既然长官们都能靠虚报战功得到提拔,那么基层的军官就更变本加厉了。

日军的数据也是水分十足

全面抗战刚刚开始仅三个月,日军就已经宣布击落中国空军飞机3000多架,要知道抗战开始中国总共也就600多架飞机,其中可用于第一线作战且编入作战部队的仅296架。由此可见,日军的战报水分也大了去了。

而关于在华日军阵亡的总人数,《冈村宁次回忆录》中的说法是:“(1946年7月1日)九时半在办事处内,举行中国事变以来阵亡军民追悼会。阵亡者约20万,近半数为我部下,不胜伤感。尽管仪式简单,总算了却一桩心愿。”而无论是依据后来日方公布的资料还是根据中方和美方的资料,关内侵华日军阵亡总数至少在40万以上(不包括东北)。据此可知,日军的数据其实也不靠谱。(据《贺州晚报》)

潜伏在日军高层的红色间谍



武田毅雄是日本特务部的创始人之一,但凡是有他参与的项目全部以失败告终。日本人开始怀疑,这个武田毅雄到底是什么人?

武田毅雄原名王毅雄,1904年4月28日出生于中国辽宁旅顺,其父是中国人,母亲是日本人。1925年父亲去世后,其母改嫁给一个名叫武田弘一的医生,由此王毅雄加入日本国籍,并改名为武田毅雄。在父亲的一位病

人——日本陆军大将板垣征四郎的影响下,武田毅雄步入了日本军队。

1934年,武田毅雄被派驻苏联使馆任副武官。在苏联政府举行的一个招待会上,他邂逅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当时化名张浩的林育英(林彪的堂兄)。在张浩的影响下,武田毅雄加入中共,随后加入红色特科。

1938年,日本暗中制定了谋杀斯大林所谓“熊工程”计划。叛逃到满洲的苏军柳斯科夫大将告诉日本人,从1930年起斯大林每隔3年都会在父亲的忌日(1月25日)到格鲁吉亚的哥里去扫墓,然后到海滨疗养地索契住几天,每日下午会去马采斯塔温泉洗澡,可以派人顺着下水道爬进直通斯大林专用浴室的锅炉房。于是日本军方召集包括武田毅雄在内的参与者进行暗杀实验。1938年12月,暗杀小组

按时出发。没有想到的是,刚进入苏联境内的暗杀队还未涉过乔鲁河,就遭遇到苏联边防部队的截击。

1939年,武田毅雄参与日本人策划的第二次暗杀斯大林的“鲜花行动”:选派4名训练有素的特工装扮成苏联军官潜入莫斯科,把定时炸弹安放在列宁水晶棺前的花蕊中,在劳动节斯大林登上检阅台时引爆。当暗杀小组潜入苏联时,等待他们的又是苏军的枪口……1964年,武田毅雄被苏联政府授予“苏联英雄”的光荣称号。

但武田毅雄的行踪如同他的情报一样神秘。1945年2月,武田毅雄在视察东宁要塞防务时失踪;1945年12月又神秘出现,进入美军驻日本司令部担任东亚情报研究室主任;1954年冬,他再次失踪……之后杳无音信。

(据《文汇报》、《辽沈晚报》)

日本投降前制造鼠疫大惨案

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对侵华日军宣战。8月9日,苏联红军外贝加尔方面军第39集团军先头部队越过中蒙边界,向侵驻西科前旗(今科尔沁右翼前旗)的日本关东军发动了闪电般的进攻。

伪兴安总省(驻王爷庙街,即今乌兰浩特市)警务厅长福地家久组织150多人的“抗苏队”,于8月11日执行事先制定的“焦土计划”,焚烧秘密档案、机关文件,烧毁多处建筑。从王爷庙街撤退前,福地家久命令伪兴安医学院院长小康从医学院的细菌库内拿出带细菌的老鼠,放进西科前旗王爷庙街粮食中,同时散布了其他的细菌和毒药。

8月21日,王爷庙街突发鼠疫,并迅速蔓延到毗邻18个旗县乃至整个内蒙古东部地区,从1945年冬至1947年春,累计死亡4万多人。仅王爷庙地区(当时全城人口不足3万)因传染鼠疫和吃掺有毒药的大米、白面后死亡的人数就达3000余人,有的全家丧命,并造成了连续三年的鼠疫大爆发,致使城区1/10的人死亡。

1946年4月,苏联红军派防疫司令廉斯基上校率专家10余人,防疫员30人,携带防疫药品、器材装备到王爷庙街控制疫病蔓延。东蒙古自治政府也成立防疫指挥部,组织卫生队和学生给王爷庙街的患者服用磺胺等药物,并以鼠疫肆虐的重点区域向外扩展,采取“由近到远,由里向外,先打家鼠,后打野鼠”的方法,对肺鼠疫患者一律隔离治疗,死者全部定点由专人火化,对未受传染的民众逐人检查防疫、服药预防。经过中苏双方共同努力,至同年10月,王爷庙街周围地区的肺鼠疫得到了有效控制。(据《文史博览》)

克林顿:为日本向邮政局施压



1994年12月,为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美国邮政局制作了一套10张的纪念邮票。这套邮票被命名为“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最后的胜利”,最后的一张邮票上是一个蘑菇云的图案,并配有“1945年8月,原子弹加速了战争的结束”的文字。日本以及少数美国的白宫官员和克林顿总统都一致指责这枚邮票“缺乏同情心”之后,白宫对邮政局施压要求重做图案,结果被换成了杜鲁门总统宣布战争结束的照片。(据《老年生活报》)